

● 龚介民

围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深化上海农村经济改革

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必须围绕这个目标，深化上海农村经济改革，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与深度，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把农村经济纳入市场经济轨道，加速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使九十年代的上海农村经济步入“超常规、跳跃式”发展的新阶段（GNP年均增长，全国为8—9%，上海为12%，上海农村为20%以上），实现小平同志提出的从“小康”的第二步发展战略目标向第三步即向中等国家水平“富裕”目标奋进。

（一）

党的“十四大”提出要高度重视农业，着力提高农业的质量、稳步增加产量，使农业面向市场、把农民推向市场。这是建立上海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所在。为此，除了要从传统的计划体制及其思维方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外，还要在改革中加快具有“城郊型”特色的农业现代建设步伐。具体要研究“六个化”：

一是农业投资和经营主体的多元化。要改变农业集体所有制的投资与经营结构的单一化局面，大力发展所有制多元化的农业的“三资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以及个体、私营企业，使农业投资和经营主体呈现多元化格局，以利优化组合土地、资金、人力、技术等国内外生产要素，合理配置资源，从而适应最大限度地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需要。

二是生产要素的全面、全方位市场化。上海农村在14年改革中已经逐步形成了资金、人才、技术、劳务、土地、信息等生产要素市场。近年来郊区的“股份制”（股本金为1.3亿元的4家股票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股本金为11.4亿元的413个股份合作制企业）、“土地批租”（已批出让3800多亩，吸收外资1亿多美元），促进了资金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发育，并正走向与国际经济接轨的规范化阶段。今后的改革重点还在培育金融市场，这是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市场。目前上海农村经济发展速度与后劲远远落后于广东、江苏苏南地区的重要原因就在融资集资上。与日本农协的作用相比，其活力也就在农协具有银行金融机构的职能。可以断言，没有发育健全的金融市场是不完整的市场。据此，上海农村在深化信用合作社改革和充分发挥国家商业银行作用的同时，重点是要恢复和发展农村合作基金会，以及建立县级具有银行职能的投资信托公司（包括以债券、股票等有偿证券进行集资融资），并与此相适应建立县、乡两级强有力的资金运行网络和管理机构。

三是生产经营的集约化。农业联产承包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都是实现农业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的手段，目的是发展农业生产力。目前上海农村人均9分地、户均经营耕地不足3亩，70%的村以户为单位安排作物茬口布局，集约经营面积不足30万亩，仅占郊

区粮田面积的8%，制约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近几年，上海农村已经出现的“二田分离”、“夏统秋分”、“服务队承包”、“合作农场”和外省市“外来承包”等经营层次变化的新情况，都是趋向于适度规模化的集约经营。上海农产品要满足上海这一国际大城市的需求，要提高上海农产品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与国际市场农产品的竞争相抗衡，必须推行以科技手段为主的集约化经营，提高农业综合利用率、转化率、投入产出率。

四是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产业化。这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和战略措施。目前上海农村已形成以村级综合服务队为基础、县乡村三级各有侧重的社会化服务网络，服务人员12万多人，兴办经济实体1600多个，利润5000多万元，服务领域已从产中向产前产后延伸。上海农村规模化集约经营依托于社会化服务体系，它是充分发挥统分结合优势的中心环节，是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增加商品量、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出路所在，是农业生产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据此，应把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经济实体作为第一产业的重要产业、第三产业的重点新兴产业来抓，列为农业投资的重点，并运用税收、信贷杠杆扶持其发展。国营农场的机组承包、川沙县村级综合服务队承包的典型经验表明：服务队的承包经营，是农业集约化经营的新的经营层次和高效益的经营方式，它适应不同模式的集约化经营，有利于以科技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队伍的素质；有利于处理好积累与消费关系；有利于集生产、经营、管理于一体，是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生产的新的经济组织形式与生产经营方式。

五是产加销、农工商一体化。这是农业面向市场后，增强自然灾害风险和市场风险承受能力，提高农副产品市场竞争能力的重要环节。其主要作用有三：为初级农产品增加附加值，提高综合效益；内部微观调节产前产中产后三个环节的利益分配关系；促进专业化生产，保护生产者利益，调动生产者积极性。

六是政府宏观管理的规范化。以高产优质高效调整农业、农产品结构是一个系统工程。由于农业生产特别是大宗农副产品生产周期长、风险大、比较效益低，政府必须在农业投入、信息指导、政策导向、市场建设、价格保护等方面，强化宏观管理，并以法律形式予以规范化。目前农业经济比较效益低，这是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根本原因。因此，政府对农副产品生产，除了在财税、信贷方面给予扶持外，重点的是深化价格改革，理顺工农产品以及农产品内部比价，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要对农产品实行价格保护的扶持政策。

(二)

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是要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素质。而要把上海农村经济纳入市场经济轨道，加快向市场经济过渡，其中心环节是要完善乡镇企业的经营机制，加速与国际市场接轨。对乡镇企业来说，目前不是“转换”而是“完善”经营机制。小平同志高度评价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与国营企业相比，其异就异在市场观念、竞争意识又早又强，异在发展市场经济的速度又快又好，异在生产要素优化组合、资源配置更为合理，最终异在活力强，经济超常规、跳跃式的发展上。

事物的对立面是互相渗透的，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转化的。市场经济的宠儿乡镇企业也受到传统经济体制的束缚，给灵活的经营机制蒙上了层层阴影，为此必须要以深化改革来完善乡镇企业的经营机制。而要抓住这个中心环节，要害就在使乡镇企业完全成为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这也是九十年代深化乡镇企业改革的目标和重点。

围绕使乡镇企业完全成为市场竞争主体的改革目标，必须抓住以下四个重要环节，处理好四大关系：

其一，企业与企业所有者的关系。上海乡镇企业的95%以上是乡村队三级合作经济所有的，然而作为企业所有者的集体经济组织（经联社、农工商总公司）形同虚设或名存实亡，其资产管理职能几乎都被乡镇党委和政府所取代。这是政企不分的深层原因。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既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也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为此，乡镇企业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必须首先要有一个代表企业所有者的机构或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这已成了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鉴于对上海农村建立合作经济组织的认识不尽一致，试点和推广也有一个过程，比较实际的还是建立乡村队三级“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作为企业所有者的代表，与企业签订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承包经营契约，其主要职能是管理集体资产，并使之保值增值。

其二，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目前，上海乡镇企业不完全是市场竞争的主体，乡镇党委和政府则充当了主体角色，政企不分现象十分突出。要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竞争主体，关键要以理顺产权关系来实行政企分开。实践证明，股份制是实行政企分开，冲破目前乡镇党政领导任董事长、总经理的政企不分怪圈的最有效办法。股份制对积聚社会资金，改变企业投资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具有重大意义；而通过明晰产权，政企分设，落实企业自主权，从而有效地完善乡镇企业的经营机制，使之真正成为经济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的意义则更为深远。乡镇企业股份制可分以下六类：一是股票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二是以发起式或募集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三是法人持股（包括联营）的股份制企业；四是向社会发行股票而不上市的股份制企业；五是职工持股的股份制企业；六是股份合作制企业。上述六类股份制企业的比重呈“宝塔形”的结构：即主要发展以明晰产权来改制原有乡镇企业或新建股份合作制企业，在此基础上创造条件发展发起式或募集式组建的有限公司，最高一层的是组建股票上市的（包括向国外发行B股）有限责任公司。

其三，企业与国家、地方的分配关系。乡镇企业负担过重是这个关系处理不当的集中反映。乡镇企业向国家上交税收是法定的“刚性”；上缴乡镇政府作为财政收入的是“刚性”；集体经济内部的工业利润共享、以工补农是“刚性”；社会福利负担、名目繁多的支出转嫁是“刚性”；地方集镇建设负担也是“刚性”，这五个“刚性”压一个积累的“弹性”，使企业财力不堪承受，百万利润的企业留利徘徊在8%左右，很难进行扩大再生产。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三资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的不同税率、不同负担、不同扣除，即乡镇企业的税率高、负担重、扣除多已成为分配关系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如不解决，已经而且越来越制约和直接影响乡镇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其四，企业内部关系。提高乡镇企业市场主体的竞争能力，从乡镇企业内部来说，要处理好企业内部关系，并以此强化企业内部的配套改革，使企业适应市场需求，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企业内部关系的中心是以权责利统一的原则，坚持和完善厂长（经理）负责制。实践证明，厂长是企业市场主体的中心人物，其权力大小，水平高低与素质好差，对企业的兴衰存亡起着关键作用。与此同时，还要处理好厂长与企业党的基层组织的政治核心的关系，与充分依靠职工的关系。为了增强企业

的整体素质，提高市场竞争能力，企业内部重点要实行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的配套改革。为了减轻乡镇企业沉重的社会负担，提高企业竞争能力，一业为主、兼营它业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两条十分有效的途径。

处理好上述四个关系，提高乡镇企业的市场主体竞争能力，还必须同时抓好乡镇企业职工的养老、待业、医疗三项配套改革，其重要性，与其说是“配套”，不如说是“前提条件”更为贴切。因为只有完成了这三项配套改革，才能真正充分发挥乡镇企业市场竞争主体的作用，才能在市场竞争的漩涡中自主地提高市场的竞争能力。

(三)

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加快上海农村经济改革步伐，还必须加速与国际市场接轨。目前上海农村经济与国际市场接轨速度较快，表现在国内外生产要素双向流动与互相接轨两个方面：一是国际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向上海农村流动，加快了上海农村经济与国际经贸惯例的吻合，加速了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去年“三资企业”新批准项目与吸收国外资金总额为前十二年总和的2倍。二是上海农村的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国外流动，以劳务输出、独资、联营、合作等多种形式将国内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融汇到境外企业或地域中去。这是上海农村参与国际分工，提高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

上海农村经济与国际市场接轨中，目前主要存在五个问题：一是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有一个过渡时期，尤其是价格体制和外贸体制的改革，有一个逐步调整的渐进过程；二是还没有充分运用国外高科技推动农村经济的产业、产品结构调整，即在境内的生产要素组合中，国外高新技术要素利用率太低（不到5%）；三是在境外生产要素组合中，还没有充分开发利用国内紧缺的国外资源；四是“三资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与国际经贸惯例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五是发展“外向型”经济人才奇缺。上述五个问题是上海农村与国际市场接轨中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它呼唤着以深化改革形成市场价格机制和外贸体制；要以引进高新技术为主发展“三资企业”；乡镇企业要以国外企业的国际惯例改制；要建立市县培养农村外经贸人才的学院，改革农村中等教育结构，增加培养外经贸人才的职业学校，以适应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需要。

纵观目前国际环境，对加速上海农村经济与国际市场接轨极为有利。我国可望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后，与国际市场接轨的环境将更为有利，这会给上海农村经济发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以下六大机遇：

第一，关贸总协定的非歧视待遇、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条款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关税对等减让的特殊规定等原则，对上海农村乡镇企业产品，特别是原来受限制的农产品、轻纺、服装等产品直接进入关贸总协定成员国市场，参与国际大流通、经济大循环，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第二，促使乡镇企业按国际经贸惯例的国际标准体系、价格标准和营销惯例来组织经营生产活动，重点完善乡镇企业的领导机制、经营机制、用工机制、积累机制、激励和约束等重要机制，使企业的财务、统计、会计核算、资产负债报表、资金成本分析与利润分配纳入国际惯例轨道，创造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基础条件。

第三，迫使乡镇企业重点运用高科技把企业、产品全面推向国际市场，加快调整和优化

企业、产业、行业、产品结构，从根本上提高乡镇企业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第四，为国外投资者创造在上海农村办企业的投资环境和按国际惯例办企业的环境，加速发展上海农村的外向型经济。

第五，促使上海创汇农业以高科技为主要手段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走高产优质高效的新路子，提高农业的转化率和综合利用率，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第六，促进政企分设，加快政府调控机制的转换，实行“五管五不管”：即管总揽而不包揽，管市场而不管企业，管宏观而不管微观，管服务而不管事务，管规划而不管计划（指生产经营计划），管法律政策的行为规范而不管具体行为。

机遇与挑战是一个刀刃的两个锋面。重返关贸总协定后的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为了加速与国际市场接轨，必须敞开国门，接受国外产品的全面挑战。重返关贸总协定后，郊区乡镇工业受到冲击的行业主要是汽车行业、机电行业、化妆品行业、家电行业、食品行业和化纤行业。如汽车工业，尽管属幼稚工业，允许国家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但这是有期限的，郊区与汽车工业相配套的生产企业要及早面向国际市场，提高综合生产能力。

重返关贸总协定后，对基础产业农业也带来挑战。近几年工农产品的比价还不很合理，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又有所扩大。但近几年缘于农产品价格提高幅度较大，一些农产品如小麦、食油等价格已接近或超过西方国家高额农业补贴的农产品价格水平，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强。而一些农产品半制成品、制成品（如奶制品、面制品、罐头食品等）的竞争能力更弱，形势较为严峻。第三产业同样也会遇到挑战，可以预见，上海农业企业、乡镇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优势者发家，劣势者败家，这是正常现象。问题在于及早研究国内外两个市场，调整产业、产品结构，早日纳入国际经济发展轨道。

总之，重返关贸总协定后发展市场经济的机遇与挑战同生，或者说，挑战本身铸成了机遇，关键在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旗帜鲜明地以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使上海农村经济跃上一个又一个新的台阶。